

蒲辅周 家传中医录



蒲志孝 蒲永文 著



人民卫生出版社

蒲辅周家传中医录

蒲志孝 蒲永文 著



人民卫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蒲辅周家传中医录/蒲志孝,蒲永文著.—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8

ISBN 978-7-117-26275-0

I. ①蒲… II. ①蒲…②蒲… III. ①医案-汇编-中国-现代
②医话-汇编-中国-现代 IV. ①R249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65764号

人卫智网	www.ipmph.com	医学教育、学术、考试、健康, 购书智慧智能综合服务平台
人卫官网	www.pmph.com	人卫官方资讯发布平台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!

蒲辅周家传中医录

著 者:蒲志孝 蒲永文

出版发行:人民卫生出版社(中继线010-59780011)

地 址: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19号

邮 编:100021

E-mail: pmph@pmph.com

购书热线:010-59787592 010-59787584 010-65264830

印 刷: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10×1000 1/16 印张:11 插页:8

字 数:180千字

版 次: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版第2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117-26275-0/R·26276

定 价:52.00元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:010-59787491 E-mail: WQ@pmph.com

(凡属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市场营销中心联系退换)



谨以此书敬献给我的父亲蒲辅周诞辰 130 周年

——蒲志孝





蒲志孝（后排左）与父（前排右）母及叔父合影

蒲志孝简介



蒲志孝，男，汉族，1941年生，四川梓潼县人，中医主任医师，绵阳市首届十大名中医，蒲氏中医第四代传人，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五十余年。历任梓潼县红十字医院院长、梓潼县中医院名誉院长、梓潼县医药卫生学会副理事长、梓潼县政协副主席、绵阳市人大代表、绵阳市政协常委、四川省青年中医学学会理事、蒲辅周学术思想研究会会长。其业绩被收入《中国医学文库》《世界名人录》等书。主要著作有《蒲辅周医话》等。

他出生于中医世家，其曾祖蒲国祯、祖父蒲显聪（号仲思）皆为梓潼县名医，其父蒲辅周先生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、中南海门诊部中医组组长、国家科委中医专题委员会委员、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，周恩来总理曾评价蒲辅周先生是一位“高明医生，又懂辩证法”，被尊为中医界的一代宗师，是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。蒲氏中医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，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，在近现代医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蒲志孝擅长治疗内科急危重症，在治疗肿瘤、心脑血管病、肝炎、肾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胃炎、类风湿、痛风、痤疮、黄褐斑、顽固性咳

嗽、习惯性便秘等方面皆有其独到之处，往往药到病除，深得患者信赖，求治者遍及海内外。经蒲志孝改进的祖传验方“蒲氏益元胶囊”具有增强免疫功能，抗疲劳、抗衰老的作用，用于治疗黄褐斑、脱发、头发早白、贫血、肾虚、性功能减退、痛经、月经不调、习惯性感冒等疗效十分显著，被众多患者赞誉为“灵丹妙药”，该药获1997年全国保健医药学术研讨会突出贡献奖。“蒲氏中医网站”2002年建立，多年来为海内外患者提供了咨询和治疗，蒲志孝先生也在多家学术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，解析蒲氏中医的辨证施治。

1979年在《新中医》杂志第3期发表了《肝气、肝阳虚简论》，并被收入《中医年鉴》，该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指出了“肝无虚寒证，亦无温补法”的观点是片面的，发展了中医脏腑学说。

1981年，为了更好地发扬其父蒲辅周先生的学术思想，他在《山东中医杂志》创刊号上开始发表《蒲辅周医话》，每期一篇，连载三年之久，中医界同仁认为《蒲辅周医话》与《蒲辅周医案》珠联璧合，是阐述蒲辅周先生学术思想的佳作。

2000年4月，出席“2000年生命科学及临床医学国际会议”，其论文《乙肝之我见》被翻译成英文介绍至海外。

2002年4月，出席“全国疑难杂症诊疗经验研讨会”，论文《益元散治疗黄褐斑疗效观察》被评为一等奖。

2004年11月，其论文《慢性乙型肝炎辨证论治的重新认识》，在第三届“国际传统医药大会”上被评为优秀论文，后被《中医杂志》发表。

蒲氏中医的理论体系是以《内经》《伤寒》为经，以后世各家学说为纬，并与几代人的临床实践相结合而成。其核心为辨证论治，因人、因时、因地制宜，一人一方，精准灵活。蒲志孝幼承家训，全面继承了其父蒲辅周先生的真传，并遵医圣张仲景“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”之教诲，努力学习各家之长，且潜心学习现代医学，通过几十年的临床实践积累与总结，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辨证思维方法。



原卫生部副部长王国强接见义诊中的蒲志孝



蒲志孝与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张镜源合影



蒲志孝先生在门诊



蒲氏中医 薪火传承



路 序

中医论著汗牛充栋，医经、医论、医案、医话、随笔、发挥，内容不同，形式各异，其宗旨皆为穷尽医理，精研方术，治病救人。古往今来，能以家传中医录撰著面世者，殊为难矣！

一代宗师，中医昆仑，蒲老辅周，名闻遐迩，蜚声中外。自其祖父蒲氏国祯先生为医，历三代传至辅周先生，厚积薄发，融伤寒、温病于一炉，集外感、内伤之大成，精通内科，兼涉妇儿，上医一国之总理，下救染疫之黎民，疗效卓著，四海共鸣。其治瘟疫之法，至今仍为传染病指南之参考。蒲老一生，不为良相，则为良医，以治病救人为己任，以临床疗效为指归，时时感念病家之性命相托，穷其一生，如履薄冰，不敢松懈，认真实践，勤于读书，时有心得，每有发挥，虽学富五车，因忙于诊务，无暇著书立说。至上世纪 60 年代，由其门生高辉远、薛伯寿等整理出版了《蒲辅周医案》《医疗经验集》，使蒲老的不少经验得以传世。

幸蒲老以降，其子志孝，专事岐黄，承继祖业，为蒲氏第四代传人。志孝幼承庭训，在自家医馆中，耳濡目染，每日见习父辈从制药到诊病。16 岁即阅本草诵汤头。19 岁高中毕业后，遵“易子而教”之规，拜梓潼名医陈新三为师。为打牢中医基础理论知识和临床辨证处置能力，蒲老常与陈师以书信往来的方式，制定或调整每年的学习计划，对志孝提出的问题也是每信必复，悉心指导。除此之外，蒲老每年还安排一定时间让志孝到京汇报学习心得，释难解惑，跟诊学习。在陈师和蒲老的双重关怀、带教下，待其结业入梓潼县医院中医科工作时，不但中医基本功扎实，而且还积累了一定的临证经验。因此，当其独立应诊时，已能很快上手，从容以对。

光阴荏苒，如今志孝先生业医已近 60 载，学验俱丰。其所撰《蒲辅周家传中医录》，为广大中医同道全面了解蒲老学术思想，提供了难得的

资料。尤其是“蒲辅周医话”篇，乃对志孝耳提面命之作，内容涉及中医健康、疾病、治疗、预防、养生等内容，可谓蒲老切身感悟，学术之精华，弥足珍贵。是书与前二书合参，相得益彰，可为领略蒲老学术思想精髓之门径！

蒲氏中医，传承至今，已历百六十年，跨越三个世纪，其上崇《内》《难》经旨，以《伤寒》《金匮》为经，后世医家及家传经验为纬，去粗取精，疗效卓著，常常立竿见影，尤于危难急重险症大病，彰显其不凡功力。

该书第二部分，尚有志孝先生医论、医案，其中有对医理的探究，也有对经典医理的发微；医案部分尤其是对危重、疑难病的医治，无不显示出志孝先生深厚的临床功底及蒲氏中医辨证准、用药精、疗效好的特色，更昭示了“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疗效”这一永恒的真理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蒲辅周老在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工作，而我就职于中央卫生部中医司技术指导科，故就中医学术问题与蒲老多有接触。1954年夏，河北冀中地区，洪灾过后突发“乙脑”疫情，经石家庄市“传染病医院”中、西医专家不懈努力，取得了接诊31例，无一死亡且很少留下后遗症的佳绩。由于在治疗过程中，中西医专家都有所参与，且分别使用了中西药物。因此，在到底是中医，还是西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。卫生部派出包括我在内的三人工作组赴石市展开了第一次调查。我依据中医温病学说和自己对热性病的治验，以及所用西药均非治疗“乙脑”专用药这一基本事实，力倡中医药是取得佳绩的关键。为慎重起见，卫生部后来又先后两次派出专家组进行论证调研。经过三上三下，最终取得了“在对‘乙脑’的治疗过程中，中医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”的鉴定结果。天有不测风云，谁想1956年北京亦发生“乙脑”疫情，据“石家庄经验”初起疗效尚可，但不久却如失去“魔力”一般，小儿高热不退，焦急中人们甚至对石家庄“乙脑治验”的真实性产生怀疑。情急之下，卫生部特邀“老中医药专家”进行会诊。蒲老在仔细辨证，认真分析后指出，不是“石市经验”有假，而是两地“乙脑”证型有异。两地虽近，但天地人群毕竟不同，前者为暑温，后者为暑温夹湿。最后蒲老只在“白虎汤”中加入了一味健脾燥湿的“苍术”，四两拨千斤，使问题迎刃而解，尽显大师高超的技艺和风采。中医治疗“乙脑”的石家庄和北京经验，是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，面对重

大疫情所取得的首战胜利，它有力地说明，中医不但善治“慢性病”而且善治“急症”；在重大疫情和卫生突发事件中，中医是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。

蒲氏中医世家，医术精良，薪火相传，不忘初心，矢志不渝，代有传人，功在千秋！

乐为之序！

康州醫翁 路志正 

纪念先父蒲辅周

——认真读书、认真实践的一生

蒲志孝

一、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

先父于光绪十四年生于四川梓潼县城西北约五里的西溪沟。弟兄姊妹七人，父亲居长。当时全家主要生活来源仅靠祖父行医供给，家境比较贫寒。先父幼时上私塾，就不得不依靠祖母娘家（何家）负担。十五岁时，他开始随祖父学医，三年后而为开业医生。

先父早年在行医的同时，颇热心于社会福利事业。当时的梓潼地瘠民贫，老百姓一旦有了疾病，更是没奈何。于是他在1935年主办了让无钱的病者享受免费医疗的同济施医药社，后来又倡办了平民教养工厂。同济施医药社一直办至新中国成立，平民教养工厂因故中途倒闭。此外，乡里凡修桥补路诸事他也慷慨解囊，乐于牵头，至今犹为人所称道。与他同时代的薛中之老先生说：“蒲老一生乐善好施，兴办慈善事业不少而又不居名位。”

但是，在旧社会里，单靠个人力量是不可能拯救广大人民的。先父曾经有过许多实干计划，如将西溪沟改旱地为水田，变荒山为果园，等等，虽经多方努力，仍不得实现。特别是当时征收“烂粮”一事，使他猛醒。所谓“烂粮”即无法征收的公粮，年复一年，数字也就越拖越大。原以为贫苦农民因天灾人祸，无力交纳，结果经他组织人力多方核查，才知大部分皆地主谎报，借以损公肥私，他决心秉公办理。不料此举竟遭士绅群起反对，威胁讹诈，不一而足。先父乃深深感到时政的腐朽黑暗，于是闭门读书，专心治医，1955年春，先父返梓时曾说：“早年我摹范文正公，想为社会尽匹夫之力，谁知能行者，仅医学之一道尔！”这就是他当时思想的写照。

二、勤奋学习，专心治医

早年的清贫生活，促使他奋发学习，而这种刻苦学习的习惯一直到他晚年双目失明为止。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：“我在青年时期，只要一有空就看书，行医之暇也抓紧阅读，晚上读书至深夜，几十年都是这样。以前买书哪里有现在这样容易，只好向别人借，如期归还，丝毫不敢失信，失信就难再借了。有一次听说别人有一部《皇汉医学》，书主珍藏，周折再三才借到手，约期一月归还。于是，白天诊病，晚上读书，每晚读到四更。到期虽未读完，亦只好如期归还，而人也瘦得脱形。稍作间隔，又厚颜再借。”

对于好书，在买不到的情况下，他就动手抄录，日积月累，盈箱盈筐。我家中原来保存了不少他早年的抄本，可惜现已十不存一。如侥幸留下的《疫痧疗集》《白喉自治》《验方选编》等，字迹工整、清晰，一丝不苟。每当我看到这些厚厚的抄本，就想到这要付出多少辛勤的劳动啊！

先父七旬以后，仍然是起床洗漱后，喝上几口茶，稍微休息一下就开始看书。上班后只要稍有空闲也是手不释卷。在他八十高龄，身体明显衰老的情况下，只要精神稍好一点，就把书拿上手了。家里除了组织上发的学习资料外，全部都是医书，我从没看见其他书籍。我曾因此问过先父，他说：“学业贵专，人的精力有限，我的智力也仅中人而已。如果忽而学这，忽而看那，分散精力，终竟一事无成。”是以几十年来，他对琴棋书画这些雅好，从不一顾。平生嗜于医，专于医而精于医。

1968年，师弟何绍奇从北京回来对我说过：“蒲伯的学习精神真是感人至深。左眼患白内障，就用右眼看书，眼和书的距离仅一寸左右，不是看书，简直像在‘吃书’啊！相比之下，我们太惭愧了！”

三、熟读、精思是先父的读书方法

先父认为学习中医应以《内经》《难经》《伤寒》《金匱》《温病条辨》《温热经纬》为主。他说：“《内经》《难经》是中医理论的基础，如果没有好的基础理论，就谈不上学好临床。如果仅读点汤头、药性去治病，那是无根之木。”又说：“《伤寒》《温病》是治疗外感热病的专书，

一详于寒，一详于热。温病是在伤寒基础上的发展。《金匱》是治疗内科杂病的专书，其中虽有‘痉、湿、喝’等一些篇章是外感病，但究竟是以内科杂病为主。后世各家皆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。学《伤寒》《金匱》宜先看原文，勿过早看注释，以免流散无穷。”

先父对《伤寒》《金匱》二书推崇备至。他曾回忆到，在刚开始应诊时，由于家传的缘故，求诊的人较多，有效者，亦有不效者。为此决心停诊，闭门读书三年，把《内》《难》《伤寒》《金匱》《温病条辨》《温热经纬》等熟读、精思，反复揣摩，深有领悟。以后在临床上就比较得心应手。他说：“当时有很多人不了解我的心情，认为我闭户停诊是‘高其身价’，实际是不懂得经典的价值所在。”

他还认为《温病条辨》实用价值很大，而且是集温热诸家大成的作品，所以应该是中医的必读书。在熟读以上诸书之后，再兼及各家，明其所长，为我所用。既为一家之言，就难免有偏激之处，不足为怪，择其善者而从之即可。先父常说，读书务必认真，不可走马观花，不然食而不知其味。读书必先看序言、凡例，而后才看内容，这样先掌握了作者著书的意图，安排、历史背景，就容易融会贯通，事半功倍。他特别强调读别人的书时，要有自己的头脑，决不可看河间只知清火，看东垣则万病皆属脾胃，看丹溪则徒事养阴，看子和唯知攻下，要取各家之长而为己用。河间在急性热病方面确有创见；子和构思奇巧，别出手眼，不过最难学；东垣何尝不用苦寒；丹溪何尝不用温补。总之，自己应有主见，不可人云亦云，务在“善化”而已。

先父非常尊重古人的经验，但也反对泥古不化，照搬照抬。他以《神农本草经》为例说：“书中列上品一百二十多种，云多服久服不伤人，轻身延年不老。历代帝王服食丹药者不少，能长寿者究竟几人？谁敢把丹砂、云母、朴硝之类矿物药长服久服？此类金石之品其性最烈，其质最重，毒发为害最烈。即使不中毒，重坠之质亦足以伤人脾胃。这些都是《神农本草经》的糟粕。本草书是愈到后世愈精细、周详。”先父喜欢在读过的书上加眉批，每次给我的书也加上按语。这些内容，有些东西真是“画龙点睛”。如上海锦章图书局影印的《幼幼集成》，纸色暗，字迹细小，无标点符号，阅读起来相当吃力。先父在每篇都加了标点、厘定讹讹，重要的地方，结合他的实践都加了批语。如对《神奇外治法》的批语是“外治九法皆良”，对《治病端本澄源至要口诀》的批语是：“举例甚

佳”；对《瘰疬证治》的批语是“各方甚妙，可用”。在《医林改错》一书上，他写道：“王清任先生苦心医学，究有心得，值得向他学习和尊敬。但仅观察十数具不完整之尸体而确定古人皆非，殊属太过。以绘图立论证之于现代解剖亦有未合，且将七情六淫一概抹煞，只论瘀血气滞未免过于简单化了。全书理论虽个人理想，但亦有可贵之处，所创之方法深得古人之义，有临床参考价值，亦可作研究之参考。所制诸方，余采用多年，有效者，有不效者，未为所言之神也。”

这些书评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。因为这不仅涉及对古代某一人物及其著作的评价，而且对于我们以较为正确的态度接受前人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，也有很大的帮助。

四、重视基本功，强调实践，严格掌握辨证论治原则

先父认为，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点所在，是前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的结晶。

他经常向我和他的学生们强调：要熟练地掌握辨证论治技巧，首先就必须苦练基本功。他认为，从基础理论说，对《内经》的基本内容如天人相应的整体观、五运六气、阴阳五行、脏腑经络、病因病机等，必须“吃”透；从临床角度说，对四诊、八纲、八法、药物、方剂，必须牢固掌握。在此基础上，再认真学习仲景著作和各家流派之说，由博返约，融会贯通，才能脚踏实地，得心应手。

他同时也强调实践的重要性，反对单纯地为理论而理论。他的学生高辉远大夫曾经深有体会地说：蒲老十分注意引导学生把学到的知识结合到实践中去。他重视学生自己多临床实践。他授徒的方法是，在学生有了一定中医基础后，最初安排跟他抄方，继而由学生预诊，他审方指正。这样学生们既易掌握老师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，又通过实践进一步验证这些思想和经验。先父认为辨证论治的基本特点，在于因人、因时、因地制宜，即针对具体对象和具体情况，相应地作出具体处理。他曾对何绍奇同学说过：要当一个好医生，有一个秘诀，就是“一人一方”。方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不能概以死方去治活人。

我保留着的1956年9月4日的《健康报》报道：北京地区该年八月，乙型脑炎患者骤然加多，北京地区有人忽视了辨证论治的原则，生搬硬套

石家庄“清热、解毒、养阴”三原则，效果较差，有的不仅高热不退，甚至病势加重，因而束手无策。中医研究院脑炎治疗组（先父在内）在研究了有关情况后，认为用温病治疗原则治乙脑是正确的，石家庄的经验也是很宝贵的。问题在于温病有不同类型，病人体质也不同，气候季节对患者的影响也不同。由于该年立秋前后，雨水较多，天气温热，因而大多数患者偏湿，如果不加辨别，过早地沿用清凉苦寒，就会出现湿遏热伏。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先用宣解湿热、芳香透窍（如用鲜藿香、郁金、佩兰、香薷、川连、荷叶等），结果效果很显著，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；有最初连服大剂石膏、犀角^①、羚羊角都高热不退的，改用上述方药后，危急的病势就及时好转了。

先父这样的见解绝非偶然。早在1945年，全川大雨，成都家家进水，秋后麻疹流行。患儿发病，每每麻疹隐伏，用一般常法辛凉宣透无效。先父仔细分析了上述情况，改用温化，立见透发，就是一例。病虽不同，治法亦异，但基本精神都是要严格掌握辨证论治的原则，从具体情况出发，灵活地考虑问题，不能因循守旧，对前人的经验死搬硬套。

五、以保“胃气”为施治中心

强调保胃气，是先父学术思想中一个极重要的特色。他认为：在患病之初，体尚壮实，强调祛邪即是保胃气，邪气一除，胃气自能通畅。在他的急性病治案中这一点是相当突出的。如《蒲辅周医案》王姓患儿重症麻疹案，始终用辛凉宣透，剂剂有石膏，而麻毒内陷的石姓小女孩，则始终用辛凉宣透佐以苦寒通降，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。先父又主张祛邪用小剂量，如轻舟之速行，尽可能祛邪不伤胃气，这样可杜绝病邪乘虚复入，流连不愈。

对于久病正衰，主张“大积大聚，衰其大半则止”。在疾病调理上尤重食疗，认为药物多系草木金石，其性本偏，使用稍有不当，不伤阳即伤阴，胃气首当其冲，胃气一绝，危殆立至。他曾举仅用茶叶一味，治一热病伤阴的老年患者为例。患者系中医研究院家属，热病后生疮，长期服药，热象稍减，但病人烦躁、失眠、不思食，大便七日未行，进而发生呕

^① 编者注：现已禁用。